

目 录

□卷首语	1
□思想解放	
必然中的偶然	
——访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、《光明日报》副总编、现《民主与法制》总编辑王强华	邓 坡 2
还给时代一个“真理”的实践	
——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、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原稿作者胡福明	邓 坡 11
难忘的日日夜夜	
——访中央党校《理论动态》原主编沈宝祥教授	邓 坡 19
思想解放是永无止境的	
——访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王瑞璞教授	邓 坡 28
□农村改革	
凤阳人“摸黑儿”唱“花鼓”	
——访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、原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	崔荣慧 36
抹不去的记忆	
——访《农民日报》原总编辑张广友	崔荣慧 47
品茗细说“大包干”	
——访全国政协常委、原安徽省省长、安徽省滁县地委书记王都昭	崔荣慧 62
在希望的田野上	

——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、农

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 崔荣慧 71

□文学复苏

从中心游到边缘

——访作家刘心武 邓 坤 81

二十年后说“惊雷”

——访话剧《于无声处》编剧宗福先 邓 坤 91

孕育复兴的诗坛

——访《诗探索》主编、首都师大新诗研究室主任吴思敬

..... 于 祎 102

大变革的开路者

——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、《文学评论》原主编何西来

..... 于 祎 115

□影视“换季”

昨夜星辰依然璀璨

——访北京电影学院78班主任教员钱学格

..... 崔荣慧 张 斌 127

将来的电影是我们的

——访北京电影学院78班学生、导演何群

..... 柴维 邓 坤 张 斌 138

那是一个光荣的时代

——访电影演员张瑜 邓 坤 146

震撼来自对时代的追随

——访电影导演谢晋 邓 坤 158

□平反昭雪

特殊的斗争方式

—— 访董怀周主要发起人之一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黄林妹	邓 坤	168
千秋功罪人民评说		
—— 访原中纪委委员、刘少奇专案复查组负责人杨攸箴	崔荣慧	181
拱卫时代真实的写信人		
—— 访原甘肃省副省长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冰	徐 璞	193
永远翻过那沉重的一页		
—— 访“能干的女将”浦熙修的女儿袁冬林	邓 坤	206
拨乱反正 直面历史		
—— 访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时的机要秘书张耀光	崔荣慧	218
□ 视觉解放		
塑造新时代的“教父”		
—— 访画家罗中立	武江生 王彦琦	231
春风已经苏醒		
—— 访画家何多苓	武江生	244
创作空间宽松了		
—— 访漫画家华君武	邓 坤	257
精神变革的艺术符号		
—— 访原《美术》杂志编辑宋宪庭	武江生	270
□ 科教春天		
飞越太平洋		
—— 访首批访美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黄永念	柴 维	284
造就“精锐”的第一步		
—— 访清华大学 78 级研究生江亿	柴 维	294
春风一夜满科苑		

——访中科院院士、学部委员林兰英 柴 维 305
拨乱反正的排头兵

——访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 柴 维 314
劫后春来早

——访原教育部副部长李琦 柴 维 327

□时代变奏

轻歌曼妙报新晨

——访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 邓 坡 静 洋 339
“东方”冲击波

——访歌唱家、原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 张国光 353
谱写崭新的时代之歌

——访问词作家乔羽 昆宝军 366
迎来多元化创作的时代

——访中国音协理事、北京市音协副主席、首都师范大学

音乐系教授王安国 邓 坡 378

□绵上山下乡

苦乐年华 青春无悔

——访老知青典型、“特别的姑娘”侯隽 邓 坡 393
青春流放的挽歌

——访《知青之歌》的作者任毅 于 楠 406
寻找回来的世界

——访北京市西城区四根柏小学体育老师俞天强 武江生 423
上山下乡的历史句号

——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刘小萌 于 楠 435

□春风又绿经济界

批判的批判

——访原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务委员、经济学家林子力	崔荣慧 450
在曲折中接近真理	
——访社科院特邀顾问、经济学家刘国光	邓 坤 461
重新研究变化中的世界	
——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大镛	高山平 474
为中国经济找回计算的“大脑”	
——访国家信息中心原副主任、专家委员会主任乌家培	徐 璞 487
突破框框的全新探索	
——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、经济学家张卓元	邓 坤 502
□敞开国门	
拓荒特区“试验田”	
——访原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兼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	
任震庚	岑运东 517
不看不知道	
——访原国家轻工部部长杨波	徐 璞 537
改革开放 先行一步	
——访原广东省省委书记王全国	崔荣慧 554
敞开大门搞建设	
——访国务院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	
员会顾问、原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专职委员季荣威	
.....	崔荣慧 568
□伟大的转折	
春风化雨花满路	

——访原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经济学家于光远	崔荣慧	583
决定中国命运的“重点转移”		
——访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原新疆第一书记、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	崔荣慧	596
为世纪末的中国定下主旋律		
——访原四川省委书记、国务院副秘书长、中央委员杜星垣	崔荣慧	607
踏上振兴中华的新长征		
——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	于 颖	618
历史性的大转折		
——访原辽宁省第一书记、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	谢春涛 崔荣慧	632
□后记		644

卷首语

还剩 1 年多，人类将跨进 21 世纪，在叩响世纪之门的时刻，我们为什么把目光投向了 20 年前？

煌煌大业，起于黯淡。追寻 1978，在百废待兴的旷墟上，我们看到的是一派生机盎然，一场影响深远的复苏悄然进行；我们看到了时代洪流的涌动与喷薄——有痛定思痛的冥想，有幡然而悟的觉醒，有义愤填膺的批判，有坦荡无羁的追求，有开诚布公的讨论，有勇敢执着的探索，有摆脱桎梏的欣喜，有果断决绝的行动……

循着 1978 的足迹，20 年的改革开放，20 年的义无反顾，20 年的跋涉进取，我们从中看到一道震惊世界的轨迹，看到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日益壮大的身影，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。

我们在此“追寻 1978”，以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 12 个主题的方式展开，以寻访当事人的形式采写，以 1978 年发生的对当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为背景，以原汁原味的“老照片”为印证，反观已成历史的时事，纪念已呈光荣的时代，抚今追昔，振奋精神，继往开来，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。

——编者

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，但 20 年前，这一问题的提出与争论，却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乃至社会政治生活中掀起轩然大波。

必然中的偶然

——访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、《光明日报》副总编、现《民主与法制》总编辑王强华

邓 坤

作为改革开放的滥觞，20 年前的这场大讨论意义深远。尽管引发讨论的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的发表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，而由《光明日报》捷足先登则可以说是一连串偶然因素连结而成的。经《光明日报》副总编李景瑞介绍，记者为此采访了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、《光明日报》副总编，当时任《光明日报》理论部《哲学》专刊主编的王强华同志。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的初稿是王强华约请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所写，王还参与了其后的一系列修改直至发表的全过程。

舆论呼之欲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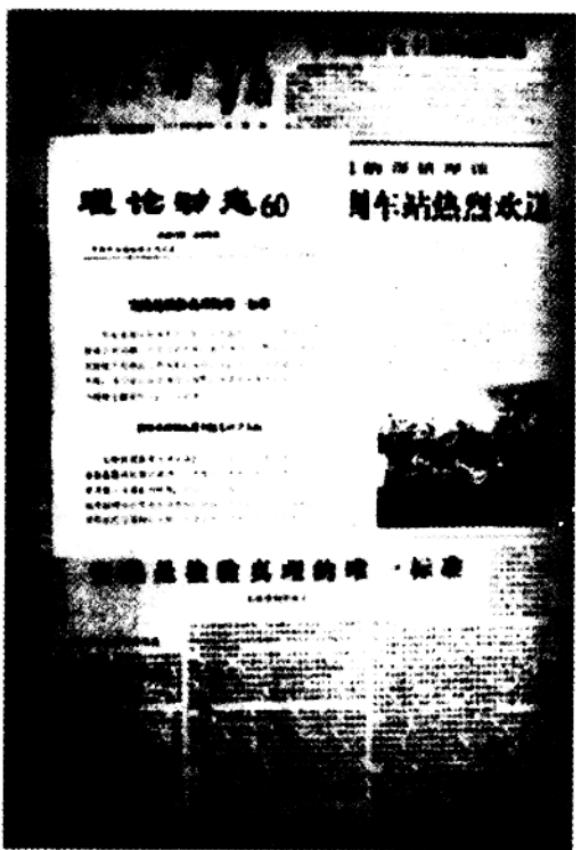
1953年，20岁的王强华从上海的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分配到《光明日报》社工作，他的妻子（也是他的同学）同时分配到北京，后来在中央政法干校工作。不幸的是，新生活刚刚开始，妻子即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，下放到青海一所劳改农场工作，直到1978年后才平反，落实政策回到北京。

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开始。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，王强华也没能躲过这场浩劫。尽管王强华是学法律出身，却对哲学、马列主义理论有较深的理解，对文革前“活学活用”毛泽东思想的片面宣传有自己的看法，再加之当时《光明日报》的特殊背景，很自然，33岁的王强华被打成“三反分子”，并成为《光明日报》社被批斗次数最多的人。当然，王强华作为总编室夜班一版负责人的工作被停止，取而代之的是打扫厕所。甚至后来在一段时间内，人身自由也受到严格限制——除了每月能出去理一次发、给在老家南京的母亲汇一次钱外，连《光明日报》的大楼也不许出。

1976年10月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正好《哲学》专刊复刊，王强华因其长期的兴趣和特长也就被任命为理论部《哲学》专刊主编。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的约写和修改、发表，是王强华到理论部后完成的第一项重要工作，他至今仍记忆犹新。而在文革中王强华及其家庭的遭遇，使他比普通人对“左”的错误有更深刻的认识，也使他对肃清“四人帮”的余毒、拨乱反正的重要性有着强烈的认同。

谈起当时的大环境，王强华说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各行各业都开始拨乱反正，但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阻障着这一运动的深入，大

家都在冷静思索这个问题。后来才明白，这个“东西”就是1977年2月7日，两报一刊（两报指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，一刊指《红旗》杂志）发表的题为《学好文件抓住纲》社论中的主要论点：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，我们都坚决维护；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。”这就是著名的“两个凡是”。这“两个凡是”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人们头上，使刚刚从粉碎“四人帮”中获得



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《理论动态》杂志首先发表了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，第二天，《光

明日报》第一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该文。

解放的中国人民又陷入了苦闷、彷徨之中。因此，如果不破除“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”、“一句顶一万句”这一观念，那么，对天安门事件（“四五”运动）、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等许多重大问题都无法解决，各行各业的拨乱反正也很难深入下去。于是，从根本理论上驳斥“两个凡是”，为进一步拨乱反正制造舆论，就

成了现实的必然要求。



说到约胡福明写稿，王强华说：“那真是很偶然的”，因为此前他们并不认识，胡福明与《光明日报》也没有联系。

“那是 1977 年 8 月，南京召开拨乱反正理论研讨会，邀请《光明日报》派人参加。因为我是南京人，与南京理论界比较熟悉，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回趟家——长期的人身不自由，使我回趟南京看望老母的愿望一直可望不可即，而且，当时我们理论部也正在酝酿为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作舆论准备，这样，我就去南京参加了这个研讨会。

“在研讨会上，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作了一个发言，认为文革时期批判‘唯生产力论’是错误的。紧接着就有两个人对胡的观点提出异议。当时我第一次见到胡，觉得他思想比较解放。会间休息时，我主动找到胡，并告知他，这个观点在北京的理论界中已被肯定。同时约他为《光明日报》《哲学》专刊写稿，内容就是有关揭批‘四人帮’、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方面的，但并没有命题。

“不久，大约是 1977 年 10 月，胡福明就寄来了两篇稿子，一篇是批江青提出的‘女人也是生产力’的，另一篇题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。当时我从南京开完会直接去上海组稿了，胡的两篇稿子，一篇被认为没有什么意思，另一篇又被认为是纯理论，总之都不适合发表。但因为是我约的稿，需等我回来再处理，没有马上退回。

“我看完稿子之后也觉得批江青那篇，由于江青的论点本身就荒谬、庸俗，没什么意思，但对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一文，

我觉得立论可以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，只是战斗性不太强，于是写信让胡修改。

“这样，在 1978 年 1 月 14 日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一文发排，印出小样。此后，在 1 月 26 日、1 月 30 日、2 月 2 日、3 月 20 日、4 月 4 日又由理论部进行了 5 次修改，在第五次修改时将题目改为《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》，决定作为 4 月 11 日《哲学》专刊的头条文章并已拼出大样准备发表。”

杨西光慧眼识珠

在简要回顾了这篇文章的前半段经历之后，已是头发花白的王强华不无感慨地说：“虽然这篇初步改定的文章提出了真理的检验标准，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的观点，批判了‘四人帮’，接触到拨乱反正的问题，但和 5 月 11 日正式发表的那篇文章相比，其现实针对性还很不够。而如果作为《哲学》专刊的头条文章发表了，恐怕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。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，从《光明日报》方面看，是当时的总编辑杨西光。”

杨西光（1989 年因病去逝）是一位老革命，文革中也受到了残酷的摧残，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他被“四人帮”打为上海三个最大的“走资派”之一，尽管杨并非上海的“第三把手”。可以说，杨西光对文革有切肤之痛，也有深刻认识。

更为凑巧的是，1978 年 3 月，杨西光被派到《光明日报》担任总编辑，当时杨正是中央党校复校后首批高级班学员。而从 1977 年底开始，中央党校在副校长胡耀邦主持下，开展了“什么是检验历史的标准”、“如何用革命实践分清路线是非”的讨论，实际上已经蕴含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。所以，当 4 月

初杨西光在审阅《哲学》专刊拟在4月11日刊出的头条文章《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》时，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感，意识到文章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。当时，杨西光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章的不足，并提出两点处理意见：第一，文章要改，要针对在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，作比较充分的论证，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；第二，这个问题大，和各方面都有关系，文章应当从《哲学》专刊上抽下来，再认真加以修改，改好后在第一版上发表。

就在杨西光指示王强华所在的理论部开始着手修改文章不久，大约是1978年4月10日，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正在写相同主题的文章。正巧这时原作者胡福明也来京参加一个会议。于是，4月13日晚，王强华就按杨西光的要求坐着杨西光的汽车，先去旅馆接胡福明，然后去三里河附近孙长江家接上他，加上当时分管理论部的负责人马沛文，一起来到《光明日报》杨西光的办公室开会，讨论如何进一步把文章修改好。当时杨西光的讲话要点至今还保存在王的笔记本上，是杨西光明确提出要批判“两个凡是”，冲破禁区，一下子就把文章的立意升华了。可以说，以后发表的文章的观点，在此次讨论中已基本定下来。

1978年4月13日后开始的文章的后半段修改过程，也有一些戏剧性的场面。王强华回忆说：“在这次讨论后，胡福明在4月14、15日改了一次，但由于他急于离京，没有来得及把讨论的观点全部反映出来。后来，我和马沛文又接手修改，于4月20日成稿，并在21日送孙长江修改。在20日的修改稿中，在文章第三部分谈到马克思、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发表后的45年中，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《宣言》的时候，增加了这样几句话：‘他们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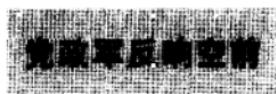
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，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。’很显然，就是针对‘两个凡是’的观点而来的。后来考虑到当时的情况，在 4 月 23、24 日的改稿中，又将这段话改得比较含蓄：‘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，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。’虽然去掉了两个敏感的‘凡是’，但其现实针对性还是保留了下来。在这一次改稿中，准确地说是第八次改稿，题目也接受当时理论部编辑张义德的建议，由《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》改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孙长江在此前我们送去的 20 日修改稿上，也不约而同地把标题改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。”

从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到《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》，再到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，文章的主题一步一步地深化了。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，怎么发表？

“按常规，发表如此重要的文章是应该送审的，但大家都明白，一旦送审，肯定不获通过；而以后再要发表类似的文章，则会遇到更大的阻力。文章于 1978 年 4 月 27 日定稿，经胡耀邦同志审阅批准，于 5 月 10 日在中央党校内刊《理论动态》先发表，第二天即 5 月 11 日，再由《光明日报》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一版公开见报。尽管如此，报社的同志也考虑了可能出现的后果：首先，《光明日报》不可能因此停刊，顶多是换一批人；其次，即使大家不能再做总编辑、编辑，但也不至于坐牢——毕竟已不是‘四人帮’统治的那个时代了。倒是文章发表后所引起的巨大反响，以及党政军各方面的空前反应，是我们至少是没有充分估计到的。”



1978年12月8日到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，会议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。



1978年5月11日，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这篇文章的当晚，新华社就发了通稿，第二天，电台全文广播。其后，共有33家日报转载，并形成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。而回顾转载情况，则颇有意思。按惯例，如此重要的文章，如果不是观点不一致或心有余悸的话，各主要报纸应该在5月12日就转载。但是，情况并非如此。5月12日转载的只有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等7家；5月13日转载的多了起来，有16家，这显然是受了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转载的影响；从14日到5月底，又有7家陆续转载。至此，共30家报纸转载。6月5日和12日各有一家转载，显然是受了邓小平6月2日在全军政工会议上讲话，对这一问题的

提出持肯定态度的影响。最后一家转载的时间是 8 月 9 日，离文章的发表已快 3 个月了。

围绕报纸提出的问题，全国 29 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和 11 个大军区的“第一把手”，也一个接一个地表示了自己支持的态度。这一表态从第一个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，到最后一个湖南省委，拖了 4 个多月之久。这在中国的报刊历史上是没有过的。

当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在公报中总结大会取得的重大成果时更指出：“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。”作为党中央的全会，对报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和引起的讨论作出如此“高度评价”，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光明日报》因其在这次思想大解放中所扮演的角色，赢得了更多读者的喜爱，其发行量在 1979 年 1 月达到了创纪录的 144 万份。

有人说，改革开放是由思想解放开始的，思想解放是由一场大讨论开始的，而这场大讨论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。在“两个凡是”的重压下，20年前的胡福明往返于京宁之间，带着希望和紧张，把一个现在看来是明明白白的“真理”还给了我们的时代。

还给时代一个“真理”的实践

——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、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原稿作者胡福明

邓 坤

1998年1月10日上午，一个明媚冬日的星期六，经过一番辗转的联络，我终于拨通了千里之外的南京，江苏省政协副主席、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原作者胡福明家的电话。听筒那边的声音很热闹，还夹杂着小孩子的奶声奶气，想必正是一家老少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，而我的电话却将胡福明拉回到20年前的往事之中。

由于采访“思想解放”专题，胡福明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早已不陌生，但第一次见到他的照片还是在几天前得到的沈宝祥教授撰写的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》一书中，书中众多的插页里有一张他们1995年在南京一起开会时的合影。照片中的胡福明微胖，头发有